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農作為方法：「以農為本」的抵抗政治

Farming Life, Farming Resistance

doi:10.6752/JCS.201403_(18).0013

文化研究, (18),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8), 2014

作者/Author：蔡晏霖(Yen-ling Tsai)

頁數/Page：217-22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13](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農作為方法：「以農為本」的抵抗政治¹

Farming Life, Farming Resistance

蔡晏霖

Yen-ling TSAI

人，如何為了土地而爭？關於土地的不同想像，如何形塑當代政治生活，並提供了哪些抵抗的可能？為了有助於思索現前港台土地抗爭的異與同，我的與談內容將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我以一個高度簡化的方式回顧台灣的土地運動，從而為工作坊中的「台灣土地抗爭」子題鋪陳一個歷時性的理解脈絡。在與談的第二部分，我則進一步將台灣近年的土地抗爭放在一個更大的、我稱之為「農藝復興」的新農運脈絡中，並在第三節說明農藝復興的某些實踐提示了一種「以農為本」的抵抗政治可能。這麼談的目的在於指出：第一，雖然台灣當前的抗爭運動著眼於土地與農業的價值，香港的抗爭則聚焦於文化認同政治，但一個歷時性的台灣土地抗爭經驗回顧有助於我們看見土地抗爭運動與文化認同運動之間的關係。第二，土地運動的回顧也揭示「土地」概念在台灣社會豐富的文化意涵與政治動員可能，而這些都為晚近的「農藝復興」新農運動及其所開展的抵抗政治提供厚實的文化養分。

一、離土與返土的發展辯證

社會學者陳瑞樺曾經考察台灣戰後一系列「以土地之名」的社會

1 第三節部分段落原發表於林樂昕、蔡晏霖(2012)。本文雖已進一步發展相關論點，但依然是一個work-in-progress，感謝林樂昕與吳紹文長期的討論與對話。我也要感謝羅永生、吳介民在《殖民、依賴、反抗：台灣與香港民主化之比較工作坊》中對此文論點的回應，以及陳允中與張聖琳發言稿的啟發。本文在定稿過程中已加入部分最新發展，所有文責由我自負。

運動，包括1960年代的台獨「返鄉」運動、1970年代的「國土」保釣運動與左翼「鄉土」運動、1980年代興起的環境運動、原住民運動與農民運動、1990年代以「地方」、「本土」之名進行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以及近年風起雲湧的「土地正義」運動（陳瑞樺 2012）。以「土地」為理解軸線，因而有助於我們把過往分別看待的政治、文化、環境、農民、社區等運動併置於一整合性的視野。然而不同年代的土地運動之間究竟有何歷史性的連結？對此，我認為人類學者徐正光為《重返美濃：臺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一書所寫的序言十分值得參考。

徐氏在序言中簡要勾勒了一個台灣戰後史的發展軌跡(1994: 6-7)。他指出，在冷戰結構與發展主義霸權之下，台灣於1950至1970年代間歷經一系列的改革與以農養工政策，將農業部門的剩餘價值有效移轉至民生與出口導向型工業，也造成農村人口大量離鄉。徐氏因此強調，「悖離鄉土」並非外省族群獨有的經驗，而是戰後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此外，在1980年代之前，利用「中國文化正統」建構其統治正當性的國民黨政權不但架空了台灣本土政治勢力，更在文化政治上排除了土著文化。換言之，台灣社會所歷經的悖離鄉土同時是個物質性與精神性的過程。

徐氏同時從資本主義擴張與意識形態霸權兩個面向理解台灣社會戰後普遍的「離土」現象，並以此為基礎思考「返土」作為一種抵抗政治的可能。他指出，由長期離土現象所導致的農村、勞工與生態問題，正是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發生背景。而在1990年間以「返鄉」與「愛鄉」作為抗爭訴求核心的美濃反水庫運動，同樣是對上述離土過程的回應與反抗。徐氏由此提點了一個由「離土」與「返土」的辯證關係理解台灣土地抗爭史的視角：如果我們把台灣戰後史視為一連串離鄉離土的過程，那麼一波波土地運動就是對上述離土過程的反抗——在此脈絡下，返土運動不只是對於逝去田園的牧歌式懷舊，而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反抗的進步性可能。

依循以上視角，我們可以繼續訴說一個高度簡化的台灣返土運動抵抗政治史。1980年代本／外政治板塊位移，社會運動風起勃興，其中尤以農民運動、環境運動、與原住民運動最直接回應了離土發展所

導致的農村凋蔽、環境污染、與族群歧視等問題，也代表種種在地議題正式進入政治資源分配的鬥爭場域。1990年代，國家發起由上往下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簡稱社造運動），以「地方」作為新的認同建構依歸，這也可以視為執政者對長期的離土發展首度做出的正式回應。然而除了推動文化上的返土，社造運動也部份地成為國民黨本土派與其後執政的民進黨繞道農漁會與地方派系生態、另闢資源輸送與選舉動員管道的工具。（星純子 2009）2000年以來，台灣在新自由主義全球逐利的發展模式下大開國土規劃與管制之門，種種以園區、大學城、都更之名進行的圈地運動席捲台灣城鄉，同時激起新一波的反圈地與反迫遷運動。質言之，執政者企圖以全球競爭與自由市場之名再一次把台灣帶上離土的列車，然而這一次拒絕上車的社會勢力亦以「土地正義」與「居住正義」之名集結，正面抵抗圈地運動背後的政商利益結合體。

二、農藝復興：台灣新農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正義運動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脈絡，就是我稱為「農藝復興」的台灣當代新農浪潮。（蔡晏霖 2012）在2004年的台灣紀錄片《無米樂》中，老農崑濱伯在夕陽餘暉裡喃喃祭天，也彷彿為世界貿易組織(WTO)陰影下的台灣農業告輓送終；相較於彼時崑濱伯豁達中帶著無奈的「末代滅農」形象，2013年揭露國土過度開發問題的紀錄片《看見台灣》卻以兩位小農——賴青松與洪箱——的土地實踐作為重建人地關係的解方。從《無米樂》到《看見台灣》，從崑濱伯到賴青松與洪箱，十年來食農議題在台灣社會愈受重視，農人與農業在公共論述裡的位置與形象也有了從悲情迎向希望的翻轉。這股新農浪潮輾轉萌生於國際與國內農業的雙重瀕危困境，也從國內外對發展主義的反思中汲取行動資源與能量。²1970年代中期以來，大型

2 當前的新農運動與全球其它地方的新農運動有高度的呼應關係，比如在危機論述、有機農法、治理機制、產銷模式等面向受歐美澳日韓相關運動的

超市系統和跨國農企公司結合逐步占據農產品通路，歐美日各地關心農業與環境永續發展人士憂心在地農業文化流失，形成一波波「新農民市集」、「慢食」、「提攜農業」、「社群支持型農業」等運動。一反主流產銷模式求量求快、求利求便的通路商主導型態，這些廣義的「在地消費」運動實踐推廣少量多樣、以在地小農為主角的另類經濟模式，除了強調地產地消、推動有機農業等友善環境等理念外，也重視食品安全、公平交易、農場工人勞動權等多元價值，希望能重建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連帶。(Fonte 2008)1990年代中葉在台北與台中興起的「共同購買」運動，是由一群具環境與消費運動意識的城市中產階級女性向日本取經而來，正是前述歐美日「在地消費」運動的台灣實踐。值得進一步析辨的是：在農／工部門流動頻繁、但農鄉價值長期受貶抑的台灣，城鄉間的精神距離其實比物理距離更難跨越。也因此，「返土歸農」不只關乎現代化工業社會的去異化工程，也同時關乎去殖民過程中深層的文化抵抗與主體再造。是在這層意義上，一群在精神上承襲1970年代「回歸現實」的鄉土文學運動、實踐上則汲取1980年代中期以來工運與環運經驗的青年，在80年代末期參與鹿港反杜邦與美濃反水庫運動，繼之藉由1990年代中後進入農村的社造資源在農鄉紮根立足。這些知青的農鄉論述及其「愛鄉返土」運動，尤其是美濃青年宏觀性地整合環保、文化、農民生存、新移民等在地生活議題的另類視野，對台灣後繼的返土歸農實踐影響深遠。

2000年後，「愛鄉返土」運動與「在地消費」運動在台灣社會逐步合流，並自2007年起因糧價上漲、無薪假與青年失業，以及層出不窮的食安風暴與農地徵收爭議的推波助瀾下沛然成勢。我們可由「農民市集」的發展觀察這股趨勢：有別於盤商批貨、菜販擺攤的傳統市場，台灣的農民市集初始多由一群農民與志工自發性地籌辦，目的在於為農民創造不受盤商剝削、能與消費者面對面接觸的另類通路。2007年5

影響，也在小農生產的價值論述、生態農法、糧食主權等議題與全球南方（尤其泰國與印尼）有著相對頻繁的交流，但台灣新農運動絕非憑空而來的橫向移植，而有其在地與自為性的發展脈絡。台灣新農運動與先前以「鄉土」、「本土」、「地方」、「社區」之名進行論述建構與資源動員的種種土地運動之間的承繼、反省與創新關係，值得另文探討。

月台灣第一個農民市集在台中誕生，2010年全台農民市集成長為15個，2013年中突破60個，2015年初達一百個，近年發展迅速而且廣獲縣市政府與學校資源支持。若從農業政策面觀察，2010年起農委會與部分縣市政府推出一連串具體政策推動青年歸農、減少休耕規模、鼓勵有機農業與本土雜糧種植，成效雖猶待評估，但已屬難得的政策性積極作為。

有論者將這股風潮稱為新鄉村主義(new ruralism)或新農村運動，我則希望透過「農藝復興」一詞凸顯此波運動的關鍵形構——亦即農意識的重新論述與多方構連，以及農實踐在空間、人群、產業，與知識框架上的積極跨界。簡要地說，「農藝復興」一詞首先強調「農」不只是「農業」，種種以「有機」、「生態」、「自然」為名的可持續型農耕(sustainable farming)也不只是一股另類的「產業」契機。在追求工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農」誠然長期被等同於「農業」，並且僅由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計量其（低）價值。與此相反，新農運動積極強調「農」在維持個人健康、環境生態、社群穩定、文化傳承與創新，以及國家糧食主權上的多元價值，部份論者甚至將可持續型農耕及其「重建人與萬物共好關係」的倫理想像視為災難社會與瀕危年代的出路，進而由此復振了「農」在當代生活裡的核心意義與多元價值。「農藝復興」的核心第一義，就是「農義復興」。

「農藝復興」也嘗試避免如新鄉村主義或新農村運動的說法，把「農」與「鄉村」必然地綁在一起。這是因為城鄉關係的相對位移正是台灣新農運動的物質與社會基礎。一方面，實體交通與虛擬網路的發展允許人、物、資金與資訊在網路與實體空間進行更彈性的移動。另一方面，都會房價飆漲與勞動的彈性化趨勢，也使得北中南都會郊區的城鄉交界帶與台南、宜蘭、嘉義、斗六、花蓮、台東等城鎮產生以低房價吸引青壯人材移居的相對優勢，並連帶創造了附近農鄉與都會區之間更多的連結可能。在這些新城鄉交界帶，農村、城鎮、都市、區域都市、全球性都市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層層包覆與隸屬的階層化附庸關係（農村<城鎮<都市<區域都市<全球性都市），而是高度變動並充滿跳躍能動性。人、物、資金、與資訊在網路與實體空間的跨城鄉移動，同時是新農運動成形的重要條件與效應。

短期來看，台灣新農運動中發展得最快的連結機制是消費，是「農」與「食」的重新連結：透過「人人都要吃」，而且吃飽之餘也要吃得好、吃得慢、吃得在地、吃得健康、甚至吃得節能減碳、吃得符合世代正義與動物倫理……等想像與慾望，傳統上屬於特定產業、人群、空間（農業、農民、農村）的農部門正透過21世紀高度發展的消費文化而與非農部門產生新的連結可能（農產禮品化、農產直送、農村旅行、農場打工、食農教育、飲食文學等）。然而我們是否真能以資本主義的機制，解決資本主義帶來的問題？質言之，新農運動中常見的倫理性消費推廣的是一種對待市場交易的不同態度，強調交換的不只是商品還有人情與人地關係。但正如長期研究全球咖啡公平貿易的 Gavin Fridell 所言，「態度」並非決定資本主義市場遊戲規則的關鍵，那些形塑生產模式的社會關係才是。（2007）換句話說，即便倫理性消費與其商業模式確實揭露了原本產銷鏈中隱而不顯的社會條件與環境成本，並在這個意義上衝擊了資本主義商品拜物，但設若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並沒有本質性的改變，那麼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還是依然朝向消費者／市場端傾斜。

三、以農為本的抵抗政治

我認為，近年台灣農藝復興場域中最具關鍵意義的發展，其實在於生產端的小農技藝再興，也就是各方小農透過農技藝的溯源、轉譯與學習以尋求產質、量能以及環境的多方提升。這對以友善環境(eco-friendly)為念的小規模生產者尤其重要：他們擺脫綠色革命生產範式下的標準化生產慣習，轉而在日常農務中藉由觀察與實作摸索出一套適地、適種，也合乎體力負荷的耕作計劃與田間管理模式。「農藝復興」在此因而指向農的實作與踐行，是農人擺脫(unlearn)標準化生產模式後重拾與自然對話的核心能力，也是小農放棄以農藥與化學肥料控制自然、轉而成為自然的照顧者與共同生產者的必備技藝。這些新興小農及其生活實踐在台灣啟動了多重面向的「再小農化」(re-peasantization)過程(van der Ploeg 2008)，也由此開啓農藝復興作為一種抵抗政治的可能。

什麼是台灣當代的小農技藝再興？在物質條件上，許多新興小稻農盡量利用在地、可回收使用的資源（例如自製液肥、採用二手小型機器），以降低對大規模機耕與遠距運輸資材的依賴；在社會資源上，新興小農亦嘗試在各個交換環節降低對商業中介體制的依賴，並願以社會性考量儘量取代市場導向的生產邏輯（例如維持小規模生產，不以追求利潤為唯一考量）。一個較早的嘗試，即是宜蘭的「友善耕作」論述與實踐。2009年原本在梨山耕讀的女農李寶蓮（阿寶）下山成立「友善耕作小農聯盟」籌備會，用意即在對當時逐步法制化的「有機農業」提出另類思考。近年的台灣，只要論及農業的未來，無論著眼於環境永續、飲食健康、在地觀光、或者農業轉型，「有機」似乎都是最有效的解方。然而放眼歐美大型有機農場的操作，往往在沙漠中靠灑水系統、在寒帶靠溫室等設施進行單一作物的大規模耕作，工業化的生產思維與慣行農業如出一轍，差別只在於把化肥換成有機肥、把化學農藥換成生物資材農藥。這樣的有機農業在生產資材與銷售網絡上依然仰賴以石化能源為基礎的大規模、遠距產銷體系。以有機農業運動國際聯盟(IFOAM)在2005年提出的四項「有機農業原則」——健康、生態、公平、照顧——來看，這種大規模、單一種植的有機操作其實根本談不上有機，而只能是議者諷稱的慣行化(conventionalized)有機，是以慣行農法的思維與制度操作的有機農業，其利潤的分配與流動也同樣朝資本所有者集中(Guthman 2004)。

台灣的有機農業發展晚於歐美，耕種面積尚不到全台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一，但相關定義與操作也已走上這條慣行化有機之路。而且，或許正因為從政府到民間社會都缺乏對歐美有機運動的歷史認識就掉入制度化有機的陷阱，所以「有機話語權」被寡占的現象更相形嚴重：從生產面來看，台灣的「有機」定義與標章早被認證單位與國家管理主義壟斷，以致於付得起認證費用的農民才有資格「有機」，並且中盤與零售通路層層盤剝的情況與慣行產銷體系並無致。就銷售端來說，消費者也尚欠對「有機」意涵的全面認識，許多人一面抱怨本土生產有機蔬菜太貴，一面花大錢購買國外的高價健康食品，以致於台灣有機店內的商品平均過半皆為進口產品。簡單來說，台灣主流的有機論述談「健康」只談消費者的健康，「生態」只看農場生態而非

區域甚至全球生態（＝減少對石化能源的依賴），對於「公平」與同時「照顧」人與土地的原則更幾近嚟聲。相反的，宜蘭友善耕作小農聯盟不談「有機」而談「友善耕作」，強調全面性照看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他們以「不用農藥，不用化肥，不傷害對作物無害的生命，避免使用進口資材」的耕作原則，力求小規模、尊重老農經驗傳承、以在地可回收性資源自製資材等農耕實踐。雖然小農聯盟已經於2012年停止運作、改以更有彈性的方式進行連結，但「友善耕作」已經是多數宜蘭新農在農法考量上的基準點。

有意思的是，許多後起新農在經過初期一、兩年的蹲點與實作後，也更勇於在不同生產環節上開展各種實驗：有人嘗試自己已留種，有人自己育苗，有人自製液肥，有人向老農學習碳化稻殼技術以補充土壤肥力，這些嘗試不只省下種子錢、肥料錢以及運輸成本，在生產過程中儘量減用石化能源，並做到在地資源的最大化利用。2014年的春耕，我在宜蘭的員山鄉與冬山鄉更看到至少四個小農社群，或者共同購買小型農機學習自己翻耕犁田、或以換工協力方式進行雜糧復耕、或者集體購買農資材與連絡代耕業者以降低個別小農的從農門檻。無論復古或是創新，這些嘗試不只凝聚了菜鳥小農，也引得老農主動出手展技，讓深溝村裡久已不見的大型手工育苗床重現江湖。以上種種生產端的努力，雖然相對規模仍小、程度參差有異，但或多或少都指向將農作勞動及其成果「去商品化」的途徑。換句話說，這些嘗試的重點不是抽換式的「以A資材取代B資材」，而是強調「農人如何掌握自己的生產資源」，包括在水源、土壤、種籽、種植模式、勞動強度、社會資源調度種種面向上更高的自主性。這樣的小農生產方式不但降低單一務農者的金錢與資材投入，也因為善用非金錢資源的在地循環，而得以與主流市場經濟及物價波動產生相對抽離的自主性關係。

總而言之，宜蘭新興小農社群的實踐，不只是在「從買A改成買B」或者「從跟A買改成跟B買」這個消費層次的選擇，而是在已然高度產業化(industrialized)、以市場經濟為主要交換基礎的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模式中另闢蹊徑……而且我認為，它雖然本於新興小農與市場經濟拉出相對距離、自主掌握生產過程與勞動結果的創新實踐，但它的抵抗潛能卻絕不以小農生產者為限：這個我所謂「以農為本」的

抵抗政治因而不只是一種消費政治，而更是一種生產政治與生活政治。而且，它雖然本於小農相對自主型的生產模式，但它的抵抗潛能卻絕不以小農生產者為限：首先，農村生活成本在城市高房價的年代實已相對低廉，即便無法自行生產糧食也可以透過市場機制以外的社會交換（勞務與物的交換）滿足部份生活所需，有效降低對現金收入的需求。其次，農村有著相較於城市更豐富也更可及的天然資源。這些在地、小規模、可循環利用的資源如水、風、沼氣與太陽能將可以在石化能源逐漸耗竭的年代提供相對自主、穩定、去體制依賴的能源。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是「農本生活」中種種以親力學習取代商業雇工、以互助交工補充層級分工、以知識與資源分享取代競爭……等等社會關係的實踐。

許可以這麼說：相較於主流經濟中「缺什麼就買什麼」，而「缺什麼」又多由市場定義的生活模式，宜蘭新農社群的「農本生活」給我的核心啓示，在於其「有什麼做什麼」、「想要什麼就動手手做或交換」的思考與勞動慣習。

如果說，小農生產的農耕模式是以混作型(polyculture)農場為最主要的資源基地，利用基地內部成員交互關係的持續複雜化（例如回收動、植物資源作為肥份來源、透過避忌作物提供生物性防治效果……等）不斷擴充此資源庫的豐富度，從而達到低外部投入、以農場內部元素為主體而共同協力提升生產條件的長期性結果；那麼，近年宜蘭的新興小農社群亦正如一個經營已久的農場基地，在新農與老農、友善耕作農與慣行農、公部門與個人資源、自然及社會的協力生產與長期投入下，已經綿密交織並累積出一層物質的、社會的、知識與技術的草根實踐沃土，讓新思維與實踐的種子在此快速萌芽。這與農村再生計畫等插管式的外部資源投入有著本質上的巨大差異：它既不直接依賴國家與大資本，也不間接依賴募款或接計畫的非營利組織，也因此更有條件維持行動者在物質生產與意義生產過程中的主體性。是在這層意義上，「農」為所有的農民與非農民提示了一種生活範式：透過可再生能源、自主生產、分享交換、社群支持等生態性與社會性實踐而提升生活上的相對自主性。我們無法也無須全面回歸一個「以農為業」的農村社會(不可能也不需要人人務農)，但卻可以創

造一種「以農作為方法」的不合作運動，為一個與資本主義保持健康距離的生活模式鋪路。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林樂昕、蔡晏霖。2012。〈農民之路：農民指路〉，《青芽兒》第52期。
- 陳瑞祥。2012。《以土地之名：台灣當代新農鄉運動》，發表於「台灣社會學年會」，2012年11月。台中：東海大學。
- 徐正光。1994。〈序一：一個起點〉，收錄於《重返美濃：臺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美濃愛鄉協進會編著，頁5-8。台中：晨星。
- 星純子。2009。〈挑戰「兩個政治」：現代台灣社會運動、社區總體營造與地方社會〉，收錄於《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續集》，若林正丈、松本正義、薛化元編，頁405-445。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 蔡晏霖。2012。《農藝復興：台灣當代新農鄉運動》，發表於「台灣社會學年會」，2012年11月。台中：東海大學。

二、英文書目

- Fridell, G. 2007. *Fair Trade Coffee: The Prospects and Pitfalls of Market-Driven Social Justi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Fonte, M. 2008. "Knowledge, Food and Place. A way of Producing, A Way of Knowing," *SORU Sociologia Ruralis* 48(3): 200-222.
- Guthman, J. 2004. *Agrarian Dreams the Paradox of Organic Farming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n der Ploeg, J. D. 2008. *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terling, VA: Earthscan publishe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